

苗域飾美，盡顯長江文明之風

苗族，主要生活於中國的南方以及長江流域，是中國歷史以及當下的多元文化生態中，極富藝術審美與創造力的一個民族。這在苗族的服飾發展上，能夠有較為清晰和突出的體現。苗族的服飾，不僅僅是衣着和打扮，也代表了苗族在文化與文明傳承背後所倡導的信仰價值以及包容精神。服飾的意象價值，往往也是歷史的傳承與見證。深圳博物館所舉辦的苗族服飾展覽，便是這種歷史的再現和重構。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苗族服飾之模特造型



頭部佩戴的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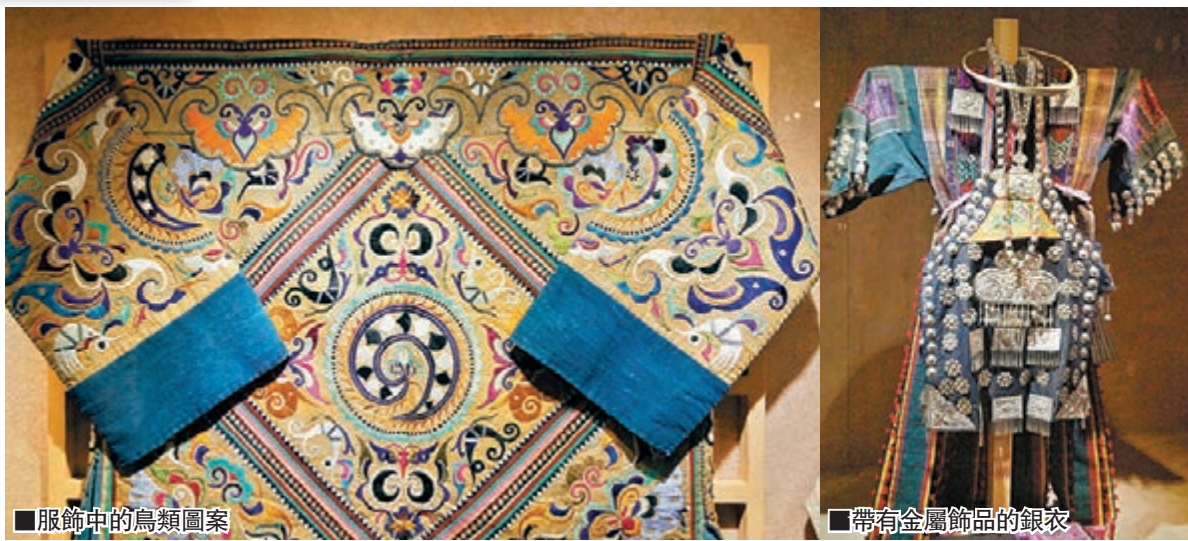
衣着往往代表着歷史的符號，同時也是對美的詮釋和演繹。苗族的服飾帶有非常強烈的自然崇拜色彩，在這種自然之美融匯於生活之美的過程中，苗族服飾是此種文化比較的重要橋樑。不僅如此，服飾的發展也並非一成不變，而是與不同時期的社會發展緊密相連。苗族的歷史發展在服飾層面中，便是一種美與時代的交響和奏鳴。

服飾中的自然崇拜

苗族的服飾中有着非常明顯的自然崇拜色彩。在遠古以及近古時代，自然崇拜往往代表着人類對自然和生活的敬畏。在大自然的色彩中，人類的崇拜，可能表現為對物的執着，例如山川、河流、樹木、花草等；也可能是對自然界中的動物的一種崇敬——例如野獸、飛禽。苗族的崇拜中，對鳥類有一種情有獨鍾的熱愛。而這種情感，也深深轉化到了服飾之中。

在苗族的很多服飾中，無論是頭飾、上衣或是裙類，鳥類的圖案是一個不可缺少的設計。而且，在同一件服飾中，鳥類形態的設計，也呈現出千變萬化的態勢。這種千變萬化，可能是飛鳥的不同姿勢，也可能是不同類別的鳥類的色彩與線條的比對與組合。從這一設計中，便能夠深刻感受到，苗族人對鳥類的喜愛和執着，乃是有着多麼深刻。

對鳥類的執着，往往也是對飛翔的渴望。中國南方的長江流域，往往多山、多水，缺少一馬平川的平原。在今日的時代發展中，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已經沒有太大的時空阻隔，航空、高鐵以及快速公路，都可以將人們以最快的速度送往自己需要抵達的目的地。但是在遠古甚至近代之前，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幾乎難以貫通，人們的交往、交流也受到了很大的阻滯。對於生活在山地丘陵以及眾多河流環抱的苗族人而言，能夠像鳥兒一樣飛向心中所要達到的目的地，便是一種對生活蒸蒸日上期待和祝願，因此，鳥類的崇拜在苗族服飾中佔有特別重要的位置。



服飾中的鳥類圖案

帶有金屬飾品的銀衣

自然的崇拜帶來的是一種堅韌的信仰。苗族儀式中的沖儺還願，也成為了儺師衣的淵源之一。任何的祈福和祝願，代表的都是將自然之美引入到生活中，不同的神祇造型，也出現在服飾中。這其實也代表了一個時代的變遷，但不變的則是苗族人對美好生活的追求。

金屬飾物，不可缺少的點綴

在苗族的服飾中，金屬飾物是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金屬飾物是對服裝的補充，也是對服飾外在與內的一種加深性的詮釋。這其中，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現象是：苗族服飾中的金屬飾物，往往帶有亮麗、華美與宏大的感觀效果。這種感覺，與苗族人對服飾的細節把握，其實有着非常重大的關係。

服飾中的金屬飾品，以頭飾為例，苗族的頭飾、特別是女性頭頂所戴的冠類頭飾，往往帶有極為壯觀的延伸感。這種延伸感，通常表現為角類的展現或是空間的擴大，這既是對大自然的一種反覆詮釋，同時也是對人與自然關聯的一種整合。就普遍意義而言，苗族的頭飾所

彰顯的華美、壯麗與莊嚴感，使得苗族女性在戴上這種頭飾時，對生活多了一分尊重。而他者在審視這種頭飾之時，也往往會為頭飾所帶來的威儀所震撼和慨歎。生活需要一種尊重和熱愛，而頭飾便是對這種心態的傳承。

不僅僅是頭飾，其實在腰帶或是上衣掛件中，金屬飾物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金屬飾物的流行，其實代表着苗族人製衣與生活審美水平的大幅提高和進步，這也是當時的中國南方社會發展歷程的寫照。不少苗族金屬飾物中，都有各種動物圖案的造型和標示，這其實也從某種意義上，代表了苗族人證明自己屬於生活與大自然一分子的歷史明志，也構成了藝術發展史中的最佳寫照。

苗族雙鳳朝陽紋繡片



苗族藤甲衣

傳教士舶來的第一所大學：登州文會館

提起中國第一所現代意義上的大學，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戊戌變法中碩果僅存的京師大學堂。其實不然，京師大學堂作為清朝政府官辦大學是第一所。而在這之前，乘西方列強堅船利炮之便遠來傳教的歐美傳教士，已經將現代大學引入中國。日前在由山東大學與哈佛燕京學社共同主辦的「登州文會館15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由美國傳教士狄考文夫婦創立的登州文會館，撥開歷史的塵埃，再次進入人們的視野。

其實學校制度早在西周時期就有萌芽，而宋代以後的各類書院、以及帝制時期的國子監、太學等等都具有類似大學的功能。但談及現代意義的大學，與會學者認為必須首先擺脫傳統的經學、神學的束縛，其次課程有沒有開設、傳授或者研究現代科學知識，是否強調服務社會的價值以及有無規範的辦學制度。按照這一標準，登州文會館作為中國第一所現代大學確符事實。

登州文會館最先肇始於1864年美國傳教士狄考文夫婦創辦於今山東蓬萊的登州蒙養學堂。學堂開設《三字經》、《中國歷代王朝簡史》以及算數、地理、科學、演講和唱歌等具有現代意義的學科，當然作為教會學校《聖經》是必學科目。狄考文自編的教材《官話算數》，被全國中學廣泛使用。該書首次將文字排列順序改為橫排，時人感到很新奇，戲稱「蟹形文字」。算式採用阿拉伯數字，分橫排和豎排兩種方法。之後隨着學校規模的擴大，還加開了代數、幾何、化學、力學、電學、天文學等課程，並進行各種科學實驗。

1877年學堂更名為登州文會館。在狄考文的努力下，他從美國募集了一批先進的教學用具。其中包括一台發電機。這使得蓬萊成為繼上海之後中國第二個使用電燈的城市。同時，學校還裝備了一台10吋反射望遠鏡。而圖書室、閱覽室、電機房、沐浴室、化學實驗室、觀星台以及博物館等設施也陸續建成。1884年，美國基督教北長老會授權登州文會館為大學，英文名稱「Tengchow College」。這比南京大學的前身、創辦於1888年的惠文書院還要早。

中國現代教育之濫觴

登州文會館不僅僅是中國第一座現代大學，其辦學制度、所培養的人才更成為中國近代大學發展的濫觴。1898年京師大學堂創辦時，有12位教習都是登州文會館的畢業生，據說其西學教習中，只有一人不是登州文會館畢業生；1901年，山東巡撫袁世凱創辦京

城之外的第一所大學堂——山東大學堂，就聘任時任登州文會館館主赫士擔任總教習，文會館師生擔任教習。其辦學章程的主要條款均仿照《登州文會館典章》。隨後，該章程隨光緒皇帝的諭令推廣至全國。

據當時統計，登州文會館畢業生「棋布星羅，幾遍十六行省」，先後有200多所學校聘用其畢業生任教，一時供不應求。京師大學堂、山東大學堂、山西大學堂、貴州大學堂等早期著名官立學堂和教會學校，都有文會館師生參與籌建或任教。創辦於1879年的上海聖約翰書院，也曾聘請多名登州文會館畢業生擔任教習。可以說，登州文會館不僅是中國第一所現代大學，也是十九世紀中國最好的大學。它的辦學宗旨、管理模式、課程設置及教學設施成為當時中國新式學堂的範本，在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發展史上佔有重要位置。

弔詭的「中、西學」之爭

當時中國教育界的流行思潮認為，中國的落後在於「中學」羈絆了「西學」的普及，故而開展西學教育是中國學者的普遍要求。而恰恰相反的

是，來自西方的教會勢力則認為中國人不應拋棄自己的文化，他們希望這些教會大學能夠「中國化」。於是中國學者要求西化，西方傳教士要求「中國化」成為當時一個弔詭的學術爭論。

由登州文會館發展而來的齊魯大學等教會學校，由於其辦學經費來源於西方，在大學的本土化上與中國學者意見相左，也曾發生過經費停撥等問題。而隨着1949年後中國政治局勢的變化，這些教會學校最終都被接管改造。雖然登州文會館的辦學活動只有短短40多年的時間，但它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畢業生，成為包括京師大學堂在內的中國早期高等學堂的中流砥柱。今天回顧它的歷史，也將引發我們對於當下中國大學的國際化與高等教育發展的思考。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永傑 山東報道



登州文會館當年的校舍



「登州文會館150周年」學術研討會(于永傑攝)



登州文會館出版的辦學章程